



编者按

本期,我们聚焦法律随笔这一看似小众的文体,汇聚学者、出版人多维洞见,探寻其在专业与通俗、坚守与创新间的平衡之道。法律随笔并非学术余墨,而是法律人对话大众的思想载体,它以无拘无束的表达打破学术壁垒,用跨界视角挖掘法理本质,在烟火气中传递法治温度,成为连接专业领域与公众认知的重要桥梁。

我们希望,通过这场思想对话,让读者看见法律随笔的深层力量——它既是学术研究的有益补充,也是法治普及的鲜活路径,更在时代浪潮中承载着凝聚法治共识、传递人文关怀的使命,让法治思想更好地扎根生活,浸润人心。

跟随法律人之笔,赴一场思想的旅行

聚焦法律随笔的价值与传播

□《法治周末》记者 尹丽

“一定还会有续篇。”

在随笔集《不一样的答案》的序言中,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教授桑本谦写下了这样的期许。他把这次出版形容为对微信公众号上笔耕岁月暂时的告别。对于写作的浓厚兴趣,让他依然希望未来继续用随笔的形式,“从大家都熟悉的事里讲出大家还不熟悉的道理”。

桑本谦教授的坚持并非个例。在法律圈,不少人选择以随笔为载体对话大众。尽管随笔并非所有法律人的“偏爱”,但它却成为一群心怀法治传播使命者的共同选择。由此,一篇篇文字穿梭于专业与通俗之间,架起了法律思想与大众认知的独特桥梁;一场场属于法律人的思想旅行,以笔墨为径,缓缓铺展。

随笔与论文:思维的双重变奏

在法律学者的创作谱系中,随笔与论文如同硬币的两面,承载着不同的思维使命。

桑本谦认为,二者最本质的区别是“写作所承受的风险结构完全不同”。“学术论文的目标很‘功利’,要讲清楚一个道理,验证一个观点,或提出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。”他说,论文有明确规范和共同语言,要求论证稳健,是制度化表达,“四平八稳,而非出其不意”。

随笔则截然不同。“自由度更大,可以汪洋恣肆,甚至天马行空。”桑本谦坦言,随笔的门槛并不低,至少在想象力与语言表达上,往往比论文更高。“它几乎没有任何制度性‘桎梏’,没有文献综述,没有方法论阐述,也没有引注来做包装,几乎是思想的‘裸奔’,只能靠内容取胜,必须提供惊奇,给出‘不一样的答案’”。

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焦洪昌亦深耕随笔创作,其笔下文字兼具法律厚度与人文温度,恰是对两种文体差异的生动注解。他的随笔常以日常为引——校园往事、田野观察、亲友羁绊,皆可成为阐释法理的载体。

□ 焦洪昌

作为宪法学者,我认为法律随笔是宪法思想走出学术象牙塔,扎根社会现实的核心载体,其传播价值根植于“降维而不降质”的表达特质,对宪法思想的大众化传播有着不可替代的三重助力。

其一,消解宪法规范的抽象性壁垒。宪法条文多为原则性表述,如“公民基本权利”“国家机构职权”等,学术论文的规范阐释虽严谨却易让大众望而却步。法律随笔可以生活场景切入——如拆迁纠纷中的财产权保障、高校招生中的平等权适用,将抽象的宪法原则转化为具象的权利叙事,让公众直观感知宪法并非高悬的文本,而是守护自身权益的“权利保障书”,实现宪法精神的生活化渗透。

其二,搭建学术与公众的对话桥梁。宪法学研究常聚焦规范解释、制度比较等专业议题,与公众认知存在天然隔阂。法律随笔以学者的专业视角为底色,摒弃晦涩术语,用通俗化语言解读宪法热点——如合宪性审查的实践意义、基层民主制度的运行逻辑,既保持核心观点的法理严谨性,又以平等的对话姿态回应公众关切,让宪法思想从“学者的研究对象”变为“公众的讨论话题”。

其三,培育社会的宪法共识与信仰。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,而实施的基础是全社会的宪法认同。法律随笔可依托学者的人文关怀,在解法规范的同时传递宪法价值——如从“齐玉苓案”(1990年发生于山东省滕州市的教育损害赔偿案)谈受教育权的宪法保障,从“疫情防控”谈基本权利的限制与平衡,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公众树立“宪法至上”的观念,推动宪法意识转化为公民的行为自觉,为宪法实施筑牢社会思想根基。

法律随笔的传播价值,本质是让宪法思想从“纸面上的法”走向“生活中的法”,在专业与通俗的平衡中,完成宪法精神的代际传递与社会扎根。

(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)

焦洪昌教授从表达目的切入,进一步阐释论文与随笔差异。“法学论文以‘学术求真’为核心,需严守规范的论证框架。”他说,论文要从问题意识出发,依托文献综述确立研究坐标,通过规范分析、实证检验等方法展开逻辑推演,最终形成具有学术增量的结论,指向“学术共同体的认可”。

而法律随笔“以‘思想传播’为归宿,是学者跳出学术范式后的自由表达”。焦洪昌表示,随笔无需拘泥于固定结构,可从个案、社会现象、生活体验切入,以通俗化的语言拆解法律逻辑,传递学术思想与人文关怀,指向“公众认知的启蒙”。此外,论文追求精准严谨的学术语言,拒绝模糊化表达与主观情感代入;随笔则可兼具温度与锋芒,融入个人感悟与价值判断,以感染力引发读者共鸣。

但随笔的自由并非无界。桑本谦强调,随笔虽不追求学术意义上的“严谨”,却必须坚守思想的逻辑自治。焦洪昌也认同这一观点。“随笔的学术严谨性不在于形式规范,而在于核心观点的法理支撑。”他说,引用法条需精准无误,解读规范需贴合立法本意,推导结论需规避逻辑漏洞,“这是学者对专业的敬畏,也是随笔区别于普通评论的关键”。

这种平衡让法律随笔成为学术研究的有益补充。桑本谦发现,随笔写作能为学术研究提供方向感、问题意识与想象空间。“当我把罪刑相适应与神经元编码联系起来时,法律人会突然发现,惩罚频谱与犯罪频谱之间的不对称问题,在生命世界中广泛存在,人类立法者居然选择了一种仿生学的解决方案。”在他看来,这为学术研究打开了新的提问方式。

焦洪昌则认为,随笔从现实中打捞的真问题,能打破学术研究的“闭环论证”。“同时,跨界思考能为学术研究注入新的理论养分,推动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,催生更具解释力的理论观点。”

跨界与普及:法治传播的新路径

法律问题天然联结多个领域,跨学科视角成为法

律随笔的鲜明特质,也让法治传播获得了更广阔的维度。

桑本谦始终坚持“只有走出法律之外,才能真正确理解法律”。他在《不一样的答案》中借助理性选择理论,将鸟群与人类社会、《红楼梦》与科幻小说、李清照的诗词与神经元编码等看似无关联的话题相联结。“这些话题表面上并不直接涉及法律或法学,甚至有些有漫无边际,但它们本质上都是制度性问题。”桑本谦说,背后都存在稳定的激励结构与约束机制,而这正是法学真正关心的核心——制度如何塑造行为。这种跨界不是“知识拼盘”,而是“通过表面差异更大的参照,发现更深层的逻辑共性”。

焦洪昌在创作《椿香》时,也善用跨学科思维。这部随笔集于2024年年底出版,出版社特意设计了精美的礼盒,使其成为图书产品创新的一次尝试。“我以‘人’为核心,串起法理与生活,聚焦至亲、法学前辈、同仁与实务人士,用人物群像串联宪法学人的精神谱系与法治建设的历史现场……让宪法从条文回归生活,让读者在烟火气中感受宪法的温度。”焦洪昌说。

学者的创作实践,离不开出版人的发掘与打磨。在长期深耕法律出版的从业者眼中,跨学科融合早已成为优秀法律随笔的鲜明标识。

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蒋浩策划的多部法律随笔集,充分体现了这一特质。“田涛先生的《被冷落的事实》,从法律田野调查视角讨论中国传统社会问题;苏力教授的《走不出的风景》,以诗性语言漫笔法律人的思想情怀;陶景洲先生的《毕竟法律人》,融合律师实务经验与社会观察;王利明教授的《守拙集》则记载了这位勤奋的学者闲暇时游览山川河流的耳闻目遇,以及对人生经历的感悟、诗词鉴赏和读书札记等。”蒋浩说,这些作品证明,跨学科视角能让法律随笔更具思想深度与现实穿透力。

法律出版社学术分社首席策划编辑张心萌,也从出版人的视角观察到:法律随笔的读者覆盖广泛。“核心读者群体全面覆盖法律职业群体、法学学者、法律专业学生”,同时还辐射大社科领域的大学生、职场人士等,满足他们“了解法律知识”“提升法律思维”的阅读需求。

□ 桑本谦

天下道理是相通的,我从来都不认为法律是孤立领域,也不认为法学可以实现学科自治,这是一种“孤岛幻觉”。只有在表面差异更大的参照中,才能发现更深层的逻辑。

举个例子。法律为什么偏爱硬性规则?这个问题不难,业余人士也能给出答案:“法律不能轻易开口子。”但这还谈不上解释,只是经验碎片的描述。

法律人给出答案可能是:实质正义有时要让位于形式正义或程序正义,这个答案在法律人圈子里可以无碍交流,因为缺口可以靠经验填充。但缺口在哪里?第一,各种正义都没有被明确定义;第二,“让位”的条件不清楚。

如果能给出这样的答案:“法律要通过容忍一定概率的错误后果来控制法律实施成本。”那么,回答者就能和法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对话。

再进一步,来看这个答案:“法律系统要在策略性适应与噪声冲击下维持制度鲁棒性(一个关键的系统性指标,用于描述系统、算法或模型在面临各种不确定因素时,仍能维持其核心功能、性能稳定性和可靠输出的能力)。如果能给出这个答案,那么回答者就加入了整个科学领域的大家庭。

我写随笔当然不会轻易使用“噪声”“鲁棒性”这类术语,但我会把这些术语背后的道理讲出来,这对法律人圈子是有助处的,至少能扩展视野。

我从来都不认为“博”和“精”是对立的,我也没见过只在一个小问题、小领域上深耕就能真正精通的情形。

相反,我认为学习的捷径是绕远,“博”和“精”可以是正相关的。只有找到差异更大的参照并建立联结之后,才会发现更深层的逻辑。

假如有人告诉我:“我的博士论文只研究意思表示。”我几乎可以立刻判断,他不可能把意思表示真正搞清楚。对比信息论的研究者就很明显:我们能想象一个只研究信号发送,不考虑信号接收的人,能够粗通信息论吗?

所谓“深耕”有时会把精力消耗在不重要的细枝末节上。比如,“我终于搞清楚罗马法与德国民法典的意思表示之间的差别了”——知道了又有什么价值?虽然我不知道,但愿保持这种无知,因为如果需要,我可以随时问AI。

AI时代来了,知识不再稀缺,认知与学习变得更容易。元认知变得更重要:关于认知的认知。知道自己知道什么,不知道什么,比如知道什么本身更重要。知识盲区不再是问题,真正的问题是要知道盲区的位置,清醒地保持盲区,不再是偷懒,而是一种进取的认知战略。

(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教授)

法律随笔的特质与使命

□ 蒋浩

作为法律出版人,我印象比较深的法律人随笔集当属早年陈兴良教授的《刑法的启蒙》、姚辉教授的《民法的精神》以及张明楷教授的《刑法格言的展开》。当初策划这套随笔时,拟定的丛书名就是《法学学术随笔》。前两部随笔是两位教授的课堂实录,最后由作者编辑成书。当年,我正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法律硕士,现场聆听陈兴良、姚辉先生的课程,思想深刻,生动有趣,便萌生了将课堂实录整理成书的想法,然后与两位老师协商,看能否成书。这应该是纯粹意义上的随笔丛书策划了。

法律是一门很接地气的学问,需要紧密联系现实生活,比起教科书、学术论文,法律随笔更强调可读性,它在采用相对轻松文学化的文字形式提供知识的同时,还可以使读者体验到阅读的快乐以及了解作者的内心创作过程。只不过,目前青年学者已经很少有撰写学术随笔的闲情逸致了。

我认为法律人的随笔集除了展示作者内心世界的感受与情怀,还应该高度关注我们的社会现实,这也是法律专业区别于文学专业的特质所在。当代社会,法律已经融入现代社会的各个角落,社会大众从未像如今这样强烈地从法律的角度来审视这个社会。法律随笔可以从专业的角度普及法治观念,从而增进彼此理解,凝聚法治共识,从而提升法治实施的效率与温度。

(作者系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)

□ 张心萌

法律随笔类作品曾经有过一个百花齐放的阶段,众多法律人都出版过法律随笔集,但真正能够流传下来的作品并不多。近几年,市场上这类口碑作品更是凤毛麟角。

究其原因,一是法律学者常规写作压力普遍很大,这类未被纳入研究成果考核范围的作品无暇兼顾;二是学术随笔的写作门槛虽不算很高,但是要达到“创新思维与表达”、为读者提供见解的水准实属不易。

法律人随笔作品的生命力在于“专业性”与“通俗性”的平衡。所有的口碑作品都有一个共性,就是都能很好地契合市场与读者需求,能够从微末社会现象切入宏大命题,从而引发读者普遍且深刻的共鸣与思索;随笔体的松散结构与时事热点解读,更是在形式上、可读性上与代入感上,充分贴合了当代读者“碎片化阅读”的主流习惯与市场需求。

近年来,法律人随笔出版的需求也发生了一些变化。更多实务界法律人(如法官、检察官、律师)加入创作队伍,关于庭审法律思维、办案谈判经验等方面的作品,均成为市场热销书。读者对“实用性”“案例化”的可操作性需求增加,更倾向于选择“能解决实际问题”的作品。

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,一是市场需求驱动,实务界法律人士对“实战类”产品更有需求;二是实务作者意识转变,更多的作者意识到随笔是传播法律思维与知识的有效方式,通过“办案故事”“庭审技巧”等内容,能让更多人了解到法律的真实运作;三是社交媒体的推动,让随笔作品更容易成为打造法律人IP、进而带动图书销量的有效传播方式。

(作者系法律出版社学术分社首席策划编辑)

